



#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 Century-long History Re-examined

Gao Yu

**Abstract:** Chinese people had misapprehended the Chinese Character and the spoken language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1980s. In late Qing, people ascribed intricacy and the “non-alphabetic” natur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as the causes of China’s backwardness in science, education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root of the inferior quality of the people. To the contrary, Western languages were considered easier to learn and master, and it is more convenient to use them.

In the 1950s, China kept on conducting study on Chinese Latinization and promoted a new Pinyin Syst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should stride towards the common family of world languages. In the 1980s, the IT industry boom once again aroused the doubt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its difficulties in typing.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SCC) emerged, developed and became stabilized all through the years under the aforesaid circumstances.

Now that the Standard Character was abolished in China, formerly existent form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the folk form, the script form, the cursive-normal form, the raw-coinage form, etc. --- are accepted as standard forms in the SCC scheme. And problems arose. Many of the newly accepted simplified characters do not adhere to the tradition-honored Six-Principles (in forming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very important form-denoting-meaning principle; and as a result these new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iscern, to learn and to memorize. Although it saves time in writing the SCC since the average number of its strokes is reduced, using this SCC scheme has to pay a high price.

There are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among which language community is a much deep-rooted and stable one. As language has its conventionality, any reform of language should first of all obtain the consent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he reform, after reaching consensus, should be put into practice simultaneously among the members. Although mainland China is the major entity of the world-wide Chinese-language community, at present, the SCC scheme is not adopted by its other members. This being the case, in time the Chinese-language community might fall apart and this is harmful to the concept of the Greater China.

The primal proble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in its two 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is not the large quantity of strokes in a huge number of characters, but is the existence of variant forms of a single character (sometimes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various forms is tremendous). If during the 1950s a list of standardized Chinese characters had been chosen from the most popularly used ones, and a ranking of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frequency of usage had been made, and these had been put into practice by administrative power, we believe this action would be better for the whole nation tha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SCC scheme.

**Keywords:** the Chinese Character;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Character reform

**Author:** Gaoyu earned his bachelor’s degree, master’s degree and PhD from th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Hubei University, and from the School of Art at Wuhan University and from the School of Art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1987, 1995 and 2000 respectively. In 2003 he finished his post-doctoral program in the School of Art at Sichuan University. At present Dr. Gao is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engages in the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th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Study on Discourse Perspective*.

## 漢字簡化思想：百年歷程及其反省

高玉



[摘要]從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人對於漢字漢語的認識有很多誤區。在清末的觀念是，中國科學落後、教育落後、文化落後、國民素質差，都是漢字繁難造成的，是漢字不能表音從而漢語文言不一致造成的；認為西文學起來容易，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就可以掌握，運用起來也非常方便。到1950年代，繼續探索漢語拉丁化，推廣漢語拼音新文字，認為中國語言應該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電腦興起後，漢字在輸入中遇到難題，漢字再次被懷疑。簡化字就是在這些語言觀、漢字漢語觀的背景下產生的。儘管簡化字不是清末纔出現的，1950年代制定並推行的簡化字大多都是有歷史根

據的，專家學者憑空造出來的字並不是很多，但問題是，古已有之的簡化字一直沒有取代“正字”，更沒有廣泛地通行，如今強行廢除正字，通行的俗字、手頭字、草書楷化字、破體字、生造字等，很多不符合漢字的六書原則，不能根據字形望文生義，實際上比正字更難識、更難記，強行“轉正”為印刷字、正字是有違其本性的。作為“字思維”文字，漢字簡化之後，“字思維”被破壞了，漢字表意體系被弄得不倫不類，雖然在書寫上簡便了一些，但意義區分卻更複雜了，很多規律被破壞了，學起來並不比繁體字容易，意義識別祇能靠死記硬背。不僅增加了中國人的學習負擔，也不利於漢字和漢語的國際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體，語言共同體是更深層更穩固的共同體。語言的書寫具有約定俗成性，共同體的成員更改文字須得到其他成員的認同，並且相約一起更改纔行。雖然中國內地在漢語共同體中是主體，但漢語共同體的其他成員都不使用簡化字，久之會造成漢語共同體的撕裂，對大中華也是一種傷害。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最大問題不是筆畫太多，而是異體字太多，有些寫法相差很大，這纔是漢字學習的最大負擔。倘若1950年代選一種流行最廣、最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字作為標準字，整理出一個分級別的通用字表，然後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會比推行簡化字要好。歷史已經走到反思簡化字、考慮統一規範使用繁體字的時侯了。

[關鍵詞]漢字 繁體字 簡化字 漢字改革

[作者簡介]高玉，1987、1995、2000年分別畢業於湖北大學中文系、武漢大學文學院、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獲得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2003年從四川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出站，201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現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話語”視角的文學問題研究》等。



漢字簡化是漢字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漢字改革又是漢語變革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漢字簡化對漢字改革、漢語變革有什麼意義和價值？中國語言學界的思考特別是反思至今甚少；很多知識人（包括一些語言學工作者）主張恢復繁體字，但為什麼要恢復？其深層的語言學理論以及文化理論是什麼？也沒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達；至於如何恢復？恢復到什麼狀況？學術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討和設計。鑒於此，筆者試對清末至今一百年來漢字簡化的背景、理論、推行方式以及實際效果等問題進行檢討，希冀推動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化。

漢字、漢語自產生之後就一直在變化着。漢字起源於圖畫，從形體上經歷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再到楷書的過程，在手書的意義上還有行書和草書。總體上看，漢字的變化是一種從圖畫到符號、從複雜到簡化的過程，雜蕪和枝葉的東西不斷地脫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東西；但是，漢字的數量和書寫則呈相反的變化，字數越來越多，異體字越來越多。漢語的變化也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書面語來源於口語，口語不斷簡練而雅化，再加上文人們不斷豐富和創造，使它越來越遠離口語；另一方面，口語不斷變化，也不斷豐富，自行發展，越來越遠離書面語。除了秦朝的“書同文”以外，中國古代不論是漢字的變化還是漢語的變化，都是自然流變，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強力所為，所以變化速度緩慢——漢字“體”的變化比較大，但結構變化不大。在中國古代，沒有人提出漢字、漢語改革的問題；但自清末以來，漢字、漢語改革卻成爲一種廣泛的思潮，並最終導致漢字、漢語發生巨變：在漢字方面，最大的變化是簡化以及與之相關的規範化、拼音方案、讀音統一等；在漢語方面，語言體系發生轉型，即從古代漢語轉變成現代漢語，與此相關的語法、詞彙、詞義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清末以來漢字漢語變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語言自身，而是語言之外的社會文化變革的要求。中西方自明末開始交流以來就時有衝突，但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落敗，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中的慘敗，則使中國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擊。面對西方列強的攻勢，中國一方面是抵禦、自保，另一方面也開始反思，進而痛苦地向西方開放，向西方學習。反思的路向和進程可以說是由表及裏、由淺及深，開始時認爲器物不如西方，後來又認爲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後認爲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於教育不發達、國民素質不高，於是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社會和文化就此發生了現代轉型，於是有了中國現代社會、現代文化。清末漢字漢語改革就是在這種反思過程中發生的。當時接受了西學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爲，中國教育之所以不發達，國民素質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於漢字和漢語——漢字繁難（難識，難寫，難記），漢語文言不一致，作爲書面語的文言文祇有少數知識分子能夠掌握運用，而民衆大多數是文盲，不能讀書看報，不能進行書面表達，甚至於最簡單的記賬都很困難。

漢字複雜難學，可以說是清末語言學界普遍的觀點。例如，盧懋章說：“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難者。”<sup>①</sup>林榕存說：“我國文字，最爲繁重艱深……中國字學，原取象形，最爲繁難。”<sup>②</sup>陳虬說：“字又着實難識得很……而且筆墨忒多，通扯起來每字總有八九筆，多者四五十筆不等。”<sup>③</sup>沈鳳樓說：“中國文字極煩，學亦甚艱，自束髮受書，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sup>④</sup>楊瓊、李文治說：漢字“義頗閎奧，而形則繁縟……形繁縟，故作書不能疾速，日僅可數千言。”<sup>⑤</sup>馬體乾說：“今六書文字，難於辨，難於記，難於解，辭難通，音難同，書難音，字難工，特較標音文字之易習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語矣。”<sup>⑥</sup>因此認爲需要改革，不同的祇是態度和具體方案。

① [清]盧懋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瞭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腹腔）》（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第2頁。

② [清]林榕存：“上都察院書”，《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7—18頁。

③ [清]陳虬：“新字圖文學堂開學演說”，《新字圖文七音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0—11頁。

④ [清]沈鳳樓：“江寧簡字半日學堂師範班開學演說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53頁。

⑤ [清]楊瓊、李文治：《形聲通·楊序》（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第1頁。

⑥ [清]馬體乾：“談文字”，《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8頁。



清末興起的漢字改革有三種態度，也可以說是三種方案。一是最激進的態度和方案，主張廢除漢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創辦《新世紀》雜誌的李石曾和吳稚暉。他們認為，西文優質，與其學習、模仿西文，對西文進行改頭換面的漢化，或者漢語西文化，還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sup>①</sup>由於民族自尊的原因，這種主張在清末並沒有多少人支持，還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後卻是一種被廣泛認同的觀點，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中不少人認為漢字終當廢除，如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都持這種觀點<sup>②</sup>；但他們同時又認為，廢除漢字是困難的，所以主張用妥協的方式，即保留漢字，但廢除文言文。二是中庸的態度和方案，以劉師培、潘籀郛、盧懋章、蔡錫勇、王照、勞乃宣等人為代表，主張不否定漢字、漢語、文言文，但在漢字以外另創造一種簡字、快字、合聲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語、官話等構成的漢語書面語，也即寬泛意義上的白話，前者供知識分子使用，後者供大眾使用。這種態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說是一種主流的態度和方案。據倪海曙統計，從光緒十八年（1892）盧懋章提出中國第一套漢語切音字方案，到宣統二年（1910）鄭東湖提出漢字筆畫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時間共產生了二十八種新漢字方案，所創造的新漢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漢字筆畫切音字、速記符號、自造符號、數目代字等，並在一定範圍內推廣、實施，還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書，但最終都成爲了歷史；不過，它們對後來的中文拼音方案、電報數碼、速記等有很大影響。三是保守的態度和方案，主張對繁體字進行改造、簡化或者簡便。這是一種思路很不清晰的態度，當時缺乏深入的討論，提出的方案並不多，也不具體，但卻是本文最爲關注的。

簡化字可以說古已有之，符號化就是一種簡化。秦隸之後，漢字結構大致固定，之後的漢字變化主要是減省筆畫，或者變化筆畫。中國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或刻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體在漢字的形體上相對規範，但仍有一定的隨意性；大量的文書則是手寫，而手寫具有較大的隨意性，特別是流佈範圍比較小的文書如日記、書信、賬目、收據、借據、文告等，書寫更是隨意，大量使用別字、錯字（例如，偏旁錯誤，筆畫錯誤）、簡筆字、破體字、草書楷化字、符號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們稱這些字爲“俗字”<sup>③</sup>。最初這些字具有私人性，書寫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隨着文書流佈範圍的擴大，這些字慢慢流行開來，越來越被認同、模仿，於是，錯誤變成了正確，別字變成了通假字，簡筆字變成了異體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這是事實上的漢字簡化。

清末最早提倡簡化字的是陸費逵，1909年在《教育雜誌》發表《普通教育當採用俗體字》一文說：“文字者，用符號代言語，所以便記憶免遺忘也。符號愈簡，則記憶愈易，遺忘愈難。而其代言語之用，固與繁難之符號無異。……我國文字，義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難實甚，肄習頗苦。欲求讀書識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捷徑，此近人簡字之法所由創也。故簡字與舊有文字，相去太遠，一時不能冀其通行。竊以爲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採用俗體字。此種字筆畫簡單，與正體字不可同日語。如‘體’作‘体’，‘燈’作‘灯’，‘歸’作‘归’，‘萬’作‘万’，‘蠶’作‘蚕’之類，易習易記，其便利一也。……余素主張此議，以爲有利無害，不惟省學者之腦力，添識字之人數，即寫字、刻字，亦較便也。”<sup>④</sup>文章發表後，有讀者致函提出疑問，陸費逵又作答文說：“採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特以簡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創造更難，就俗字而採用之，不過略減正體字之繁重，不得已也。且記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採

① 參見李石曾《進化與革命》，吳稚暉《編造中國新語凡例》、《新語問題之雜答》、《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篇後》等文章。關於其具體觀點，筆者另有文章詳細介紹。

② 關於漢字的存廢問題，胡適、錢玄同的觀點前後是有變化的。胡適在美國留學時認爲廢除漢字的觀點是幼稚的觀點，新文化運動之後則認爲中國最終會走上拼音文字。關於錢玄同、陳獨秀等人漢字存廢問題的討論，見《新青年》4（1918）。

③ “俗字”的產生其途徑是多方面的，不僅僅祇是已有漢字簡化，也有已有漢字“繁化”（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3章）。

④ [清]陸費逵：“普通教育當採用俗體字”，《陸費逵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59頁。此文原載《教育雜誌》1（1909）。



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體代之也。”他認為，使用俗體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處極多，而苦筆畫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筆字，不知不覺，轉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體字。以其易寫易記，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極易，雖功令懸為厲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體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sup>①</sup>需要說明的是，陸費逵這裏所說的“簡字”並不是簡化字，而是盧懋章等所說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纔是簡化字，後來稱之為“減筆字”、“簡體字”。陸費逵主張用已有的、已經廣泛流佈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簡化字，並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簡化，這與後來的簡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別的。陸費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簡化漢字設想和思路，在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回應，當時漢字改革的主流還是切音字、簡字等。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這個問題纔再次被提了出來。

## 二

語言變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內容，白話文就是新文學的最重要標誌之一。與清末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等不同，面對漢字和漢語的缺陷和問題，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更關注的是漢語而不是漢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廢除漢字，但同時又認為在當時是不可能的，所以採取的策略是把漢字存廢問題擱置起來，專注於漢語改革，即提倡並使用白話文，否定並廢用文言文。對於吳稚暉等人提出的“廢除漢字”以及廣泛的“漢字革命”主張，新文化運動提倡者也是有回應的，概括起來就是提倡簡化字。

翻閱《新青年》，新文化運動陣營最早提出簡化漢字的人是錢玄同，但其思想有一個變化的過程。當他的老師章太炎在民國前夕寫《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長文的時候，他是贊同的；但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又轉而贊成吳稚暉已經放棄的“萬國新語”的觀點，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論世界語與文學》、《答陶履恭論Esperanto》、《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答孫國璋論Esperanto》、《關於Esperanto討論的兩個附言》、《漢文改革之討論》、《答姚寄人論Esperanto》、《答胡天月論Esperanto》、《答區聲白論Esperanto》、《關於國文、外國文和Esperanto》、《Esperanto與現代思潮》等一系列文章，主張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與胡適、陳獨秀等人主要思考語言改革略有不同，五四時期的錢玄同既思考語言改革，也思考漢字改革，他的語言文字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對漢字、漢語反思基礎上的。民國初期到“五四”前後，學術界一些人發現，漢語尤其是文言文不能準確表達西文的思想文化。錢玄同是認同這一觀點的。他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物之名詞，一無所有。”<sup>②</sup>與胡適、陳獨秀等人在語言上主張廢除文言文、改用白話文不同，錢玄同主張廢除漢語，改用世界語，或者在漢語之外增加世界語：“然不廢漢文而提倡世界語，有何不好？弟意最好從高等小學起，即加世界語一科。”<sup>③</sup>“五四”初期的錢玄同很激進，不僅反對文言文，也反對白話，反對漢字，反對中文拼音化。他說：“中國之字形，不消說得，自然不能攙入於拼音文字之內；中國之字義，函胡遊移，難得其確當之意義，不逮歐洲遠甚，自亦不能採用；中國之字音，則為單音語，同音之字，多且過百，此與拼音文字最不適宜者。”<sup>④</sup>漢語不能拼音化的觀點在他後來的文章中講得更明確：“有人主張改漢字之形式——即所謂用漢字羅馬字之類——而不廢漢語……殊不知改漢字為拼音，其事至為困難：中國語言文字極不一致，一也；語言之音，各處固萬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復紛歧多端，二也。製造國語以統一言文，實行註音字母以統一字音，吾儕

① [清]陸費逵：“答沈君友卿論採用俗字”，《陸費逵文選》，第64頁。此文原載《教育雜誌》3（1909）。

②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第1卷，第162、166頁。此文原載《新青年》4（1918）。

③ 錢玄同：“論世界語與文學”，《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21頁。此文原載《新青年》4（1917）。

④ 錢玄同：“答陶履恭論Esperanto”，《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97頁。此文原載《新青年》2（1918）。



固積極主張；然以我個人之懸揣其至良之結果，不過能使白話文言不甚相遠，彼此音讀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歐洲言文音讀之統一，則恐難做到。”<sup>①</sup>他的解決辦法就是廢除漢字、漢語，改用世界語，“我以為中國廢漢文而用Esperanto，這是將來圓滿之解決”，至少應該是兩條腿走路，在通行漢字漢語的同時推廣世界語。<sup>②</sup>然而，在1920年代初，文言文作為一種統治性的語言大勢已去，白話文一統中國不可逆轉，錢玄同主張世界語的文章就是用白話文寫成的。所以，對於在中國推行世界語取代漢語——不僅取代言文，而且取代白話文，錢玄同自己也沒有信心。特別是白話文使用範圍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成為“新國語”之後，錢玄同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在語言上轉而支持“國語羅馬字”。1923年，他提議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sup>③</sup>；兩年後又說：“說到製造中國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現在也主張用羅馬字母。以前《國語月刊》出‘漢字改革號’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傾向於羅馬字母了。不過彼時被音理所囿，以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夠與發音密合一點的，所以又想試用標準音符（國際音標）。但是不久就覺得這個意思是錯誤的。”<sup>④</sup>而在文字上則主張，改造漢字即減省漢字筆畫。錢玄同對於漢字的態度可以說由“漢字革命”轉變為“漢字改良”。

1920年，錢玄同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這是中國自漢語產生以來首次系統地提出的漢字簡化字方案。他說：“前幾天，獨秀先生對我說：‘表中國國語的文字，非廢去漢字、改用拼音不可。’這個意思，我現在是極端贊成的。但是我以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間就能夠製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氣、亂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拼音文字製成以後，恐怕還要經過許多波折，費上無數口舌，纔能通行。我以為我們就使講‘一廂情願’的話，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總還在十年之後。如此，則最近十年之內，還是用漢字的時代。漢字的聲音難識，形體難寫，這是大家知道的；今後社會上一切事業發展，識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的用處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這也是大家知道的。既然暫時還不得不沿用漢字，則對於漢字難識難寫的補救，是刻不容緩的了。”<sup>⑤</sup>其補救的辦法就是減省漢字的筆畫。這是一個妥協、無奈、暫且的辦法，但卻是一個具有操作性、現實性的辦法。錢玄同提出的漢字簡化的八種方法，都為1950年代漢字簡化方案所採用。

到了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一期“漢字改革號”，其中有胡適、黎錦熙、錢玄同、周作人、蔡元培、趙元任等人的文章。<sup>⑥</sup>從中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和踐行者對於改革漢字達成了共識，差別祇是簡化漢字與國語羅馬字的方案。1935年，錢玄同主持編選了《簡體字譜》；在此基礎上，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於同年8月21日發佈命令，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正式推行簡體字，但卻遭遇強大的阻力；到了1936年初，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廢止《第一批簡體字表》，這對於漢字簡化之路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再加上1936年後錢玄同的身體每況愈下，並於1939年逝世，簡化字研究、倡導以及推行雖然不乏來者，但微弱的聲音完全被強大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聲音所淹沒。

1949年始，漢字簡化之路峰迴路轉。這年5月，黎錦熙聯合當時北平各大學的語言文字專家寫信給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重新開始研究和推動文字改革。吳玉章先請示劉少奇，又寫信給毛澤東，均得到支持；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即宣告成立。<sup>⑦</sup>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文字改革組織，吳玉章為主席，黎錦熙、胡喬木為副主席，成員既有學者也有官員，主要工作是組織對拉丁化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由於之前在請示劉

①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164—165頁。

② 錢玄同：“關於國文、外國文和Esperanto”，《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333頁。此文原載《新青年》2（1919）。

③ 錢玄同：“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125頁。

④ 錢玄同：“國語羅馬字”，《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355頁。

⑤ 錢玄同：“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400—401頁。此文原載《新青年》3（1920）。

⑥ 國語研究會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⑦ “60年教育紀事：開啓漢字的簡化時代”，《中國教育報》2009-09-17。



少奇時，得到的指示是：“可以組織這一團體，但不能限於新文字，漢字簡化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sup>①</sup>因此，簡化字研究也是其中一項內容。之後，在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學術機構、民間團體的大力推動下，漢字簡化運動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

新中國成立之後，簡化字方案從醞釀到出臺到最後推行，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漢字難識、難讀、難寫，是普通大眾提高文化素質的瓶頸，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國政府都無力解決這個問題，新中國進行新文化建設，這正好是一個契機。二是舊中國文盲非常多，而完整、普及、系統的教育體制又不可能一時建立，識字特別需要“速成”，簡化字為漢字識字“速成”提供了可能性。三是與國民政府的精英文化建設不一樣，新民主主義文化更強調大眾文化建設，首先就要解決的是大眾識字問題，漢字改革自然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有：

1952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馬敘倫任主任委員，吳玉章任副主任委員。該機構隸屬於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

1953年，中共中央設立文字問題委員會，胡喬木任主任，范文瀾為副主任。

1954年，周恩來總理提議，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批准，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吳玉章為主任，胡愈之為副主任，並於12月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修正後的《漢字簡化方案（初稿）》。

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

1956年，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並在《人民日報》發表《漢字簡化方案》全文。

國務院“決議”的公佈和《漢字簡化方案》的發表，標誌着清末以來漢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後，漢字簡化運動還發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例如，1963年，“漢字簡化方案”小組對《漢字簡化方案》進行修訂，發佈《簡化漢字修訂方案草案》，同時編輯出版《簡化字總表》。1977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sup>②</sup>，徵求意見，並在一定範圍內試用；但1986年國務院正式廢止這個方案，並在《人民日報》重新發佈《簡化字總表》。<sup>③</sup>2009年，教育部新研製出《通用規範漢字表》，網上公佈以徵求社會意見，其中設計對44個漢字進行“整形”，但遭到廣泛的質疑，2013年國務院最終發佈《通用規範漢字表》時，沒有採納漢字整形方案。與1986年《簡化字總表》相比，《通用規範漢字表》收錄了226個類推簡化字，如“冂”等<sup>④</sup>。而對於“整形”字，研製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個說明：“鑒於字形調整目前尚未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而且對印刷宋體字的字形規範，也不應該祇着眼於宋體字本身，還應該考慮到與之相關的幾個關係的協調問題，如各種主用字體之間的協調、簡化字與繁體字之間的協調、已定規範漢字與大字符之間的協調等。如此複雜的問題，不可能讓《通用規範漢字表》畢其功於一役，而應做出更長遠更全面的規劃。”<sup>⑤</sup>漢字“整形”方案雖然“失敗”了，但可以肯定，漢字簡化的研究還會繼續下去。

### 三

反思一百年來漢字簡化的各種方案、歷程以及理論，需要檢討的方面很多。不管是清末、

① 王均 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第54頁。

②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7）。

③ 分別見《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的通知》、《關於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的說明》（王均 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第645、646頁）。

④ 《通用規範漢字表》（北京：語文出版社，2013），第2頁。

⑤ 王寧 主編：《〈通用規範漢字表〉解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第66頁。



民國還是新中國初期，語言學界對於簡化漢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認為它是漢字改革的暫且辦法。1955年，毛澤東還說：“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sup>①</sup>但1960年代之後，簡化字被當作了漢字的終極形態，漢字簡化被誤作為漢字改良的主導方向。如果說清末、民國的簡化漢字是“漢字病”之“止痛”的話，那麼，1950年代漢字簡化則是“漢字病”之“根治”了。

陸費逵最早提倡簡化漢字，但他同時又明確說簡化漢字不是漢字改良的“正法”。同樣，錢玄同“五四”之後一直提倡簡化漢字，並提出了具體的方案，包括簡化原則、簡化方向和具體措施等，但他認為解決漢字問題的根本方式是“漢字革命”，即“將漢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現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sup>②</sup>，“把漢字改為拼音的中國新文字，將來總有這一天”。<sup>③</sup>由於漢字革命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籌備”期還不能完全脫離漢字，而簡化字則是“補偏救弊的辦法”：“有的主張將國語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張將現行漢字減省筆畫的。……我也是持這種主張的一分子。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我們當然應該竭力去進行。但這種根本改革，關係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目的的。……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漢字成功了纔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sup>④</sup>可見在民國時期，簡體字並不是漢字改革的根本目標，更關注的還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國音統一等問題。

1950年代，漢字簡化字運動興起，發展成為國家行為，最終產生《漢字簡化方案》和《簡化字總表》，並通過行政方式大力推行，從而實現全國文字印刷簡體字化，似乎簡化字方向成為漢字改革的主流，但其實不然。1951年，毛澤東對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sup>⑤</sup>所以，1950年代初期文字改革在思路上基本都是強調拼音的根本性，而文字簡化不過是暫時方案，是為最終漢字拼音化做準備。吳玉章說：“漢字簡化並不能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因此我們還必須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準備工作。為了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使漢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準備工作。”<sup>⑥</sup>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也明確說：“漢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簡化漢字並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是適合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的。”<sup>⑦</sup>由此可見，簡化漢字在近百年漢字改革中不過是附屬品，被當作是準備性的、過渡性的。然而，漢字一旦簡化並全民運用、普及，就很難有其他可能性了。

近百年漢字簡化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清末和民國是一個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後是另一個階段。兩個階段最大的不同是，前一個階段總體上是學術推動，後一階段總體上屬於組織推動。清末和民國時期的漢字簡化，主要是學者探討，提出方案，討論基本限於學術領域，雖然也得到政府支持，如1935年錢玄同等人設計的“第一批簡化字”就得到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傑支持，從而以教育部名義發佈命令，但民國政府在文化建設方面非常軟弱，推行不到半年就在一批學者、政客的反對聲中宣佈收回、廢止。之後，《第一批簡化字表》以及它的前身錢玄同主持編選的《簡體字譜》中的大部分字都被1956年新中國制定的《漢字簡化方案》所吸收，《漢字簡化方案》和《第一批簡化字表》在思路、觀念和具體的方法、內容上都一脈相承。由此可以看出，學術本身並不具有決定性，學術背後的力量纔是決定其不同命運的根本原因。

而新中國成立後，漢字簡化運動是根據國家領導人的指示或者批示，確定文字改革的方向，再確定各種組織機構，各種宣傳，最後層級推進，從而以一種嚴格的行政方式推行。從相關的文

① 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454頁。

② 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76頁。

③ 錢玄同：“幾句老話——注音符號，G. R. 和簡體字”，《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487頁。

④ 錢玄同：“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85頁。

⑤⑥ 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27、30頁。

⑦ “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第12頁。



獻看，文字改革方案是國務院組織專家，經過反復討論，八易其稿，纔最後制定出來的；這中間又反復徵求專家、學者以及普通群眾的意見。這種大規模的行為，是任何一個學術團體都無法完成的。簡化字方案出臺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佈決議，國務院公佈決議，教育部發佈通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佈通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分別發表“社論”，這與清末與民國時期漢字簡化運動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正是因為強大的行政推動力，所以1950年代漢字簡化運動推行得非常成功，短短幾年時間，中國大陸就廢除了繁體字，實現了全國教育、印刷、手書的簡體字化。

當然，1950年代開始的中國文字改革，吳玉章等人最初設想和試圖推行的還是在民國時期就思考比較成熟、並且得到一定程度推行的漢字拉丁化，如拼音文字。但結果是，拼音文字後來被放棄了，僅祇留下一個漢語拼音方案，而漢語拼音方案和漢字拼音化是有本質區別的。漢語拼音本身不是文字，它不過是一種對漢字進行注音的工具，它不否定漢字，也不能替代漢字，本質上是漢字的輔助性工具，解決了漢字不能表音的問題，當然在其他方面比如通訊、編序、檢索等方面作用也非常大。而漢語拼音新文字則是反漢字的，主張廢除漢字，使漢語脫離漢字而走上拼音字母化。例如，1931年在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有這樣的話：“大會認為中國漢字是古代社會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並反對用象形文字的筆畫來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麗的拼音、中國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辦法。”<sup>①</sup>由此可見漢語拼音和漢語拼音文字之間的本質差別。事實上，1950年代中國文字改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制定並推行簡化漢字，選定並推廣普通話，制定並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對漢語的進步其作用是巨大的，普通話是統一國音，漢語拼音則是為漢字標註國音，兩者於漢字來說都具有外在性，而祇有簡化漢字對漢字具有革命性的影響，真正改變了漢字。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意義和作用爭議很小，簡化漢字卻爭議很多，因為它給漢語和漢字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 四

由於漢語在讀音上存在着地域上的差異，以致同樣是說漢語但地域不同的人卻無法交流，但因為有漢字，纔維繫了中國文化的統一；假如語音不同，文字也不同，那中國在文化上早就四分五裂了。民國時期，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曾經設計出包括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話拉丁化新文字、廣州話拉丁化新文字、廈門話拉丁化新文字的四種方案，假如當時推行了，那今天的中國就不僅是語音不統一，而且文字也不統一，北京人到廣州還得帶翻譯。從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人對於漢字漢語的認識有很多誤區。在清末，語言學領域一個普遍的觀念是，中國科學落後、教育落後、文化落後、國民素質差，都是漢字太繁難造成的，是漢字不能表音從而漢語文言不一致造成的；並且認為西文學起來容易，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就可以掌握，運用起來也非常方便。1950年代，中國繼續探索漢語拉丁化，推廣漢語拼音新文字，認為中國語言應該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電腦興起，漢字在輸入中遇到難題，漢字再次被懷疑。簡化字就是在這些語言觀、漢字漢語觀的背景下產生的。

的確，簡化字不是清末纔產生的，1950年代制定的簡化字大多都是有歷史根據的，專家學者憑空造出來的字並不是很多。但問題是，簡化字雖古已有之，卻沒有取代“正字”，更沒有廣泛地通行。強行廢除正字，通行俗字、手頭字、草書楷化字、破體字以及生造的字等，實際上是違

<sup>①</sup> “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中國語言的新生——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9），倪海曙編，第54頁。文字改革之所以走簡化字廢拉丁化之路，與毛澤東的態度有關。毛澤東曾對吳玉章說，“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吳玉章：“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吳玉章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上冊，第664頁〕。漢字拉丁化其實就是脫離實際。



背了漢字自然流變的規律。草書是一門特殊的藝術，也是一門特殊的學問，草書本質上是漢字快速書寫的結果，快寫的過程中自然有很多筆畫省略，在這一意義上，草書可以稱為簡體字，漢字簡化借鑒草書的簡化方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草書異常複雜，千變萬化，有時一個字有幾十種甚至上百種寫法，有的寫法不僅與正字相距甚遠，互相之間也相距甚遠，沒有相似性和關聯性，如“白”、“自”、“有”、“不”等。相反，有些完全不同的字在草書中基本上可以寫成一個字，如“成”和“來”、“不”和“石”、“存”和“孝”、“深”和“珍”等；很多完全不同的偏旁部首和點畫在草書中可以寫成一樣，如單人旁和雙人旁在草書中都可以寫成一豎，“二”、“止”、“工”、“土”、“豆”、“彡”、“匕”、“彡”、“麗”、“虫”、“八”、“人”都可以寫成二橫即“二字元”。<sup>①</sup>正因為如此，草書的很多字不僅一般人不識，就連從事書法創作和研究的人辨識起來也不是很輕鬆，需要借助釋文以及草書工具書。所以，簡化字的草書楷化方式雖然有歷史的、書寫的根據，但這個根據其實是不足為據的。

同樣，俗字、手頭字包括破體字作為簡化字也是有問題的。所謂“俗”字，是相對於“通”字和“正”字而言的，唐代顏元孫在《干祿字書》中對其作過區分，張涌泉教授的解釋是：“俗字是一種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於六書標準的淺近字體，它適用於民間的通俗文書，適宜於平民百姓使用。顏元孫的所謂‘通者’，其實也是俗字，祇不過它使用的範圍更大一些，流延的時間更長一些。換句話說，‘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sup>②</sup>俗字可以變成“通字”，通過流行可以變成正字，但這個過程在自然流變中非常緩慢。漢字在唐代之後已變得相對穩定，俗字很多，但要想取得正字的合法性並不容易，因為正字更有優越性，更廣泛地被認同和接受。

根本原因還在於，俗字也好，手頭字也好，其構成很多都不符合漢字的基本規則，即不合六書原則，很多字可以說是任意的符號，也可以說是“黑字”，有時祇有書寫者和特定的接受對象明白，甚至有時就是祇寫給自己看的。與陸費逵提倡俗字一樣，1930年代，胡愈之、蔡元培、郭沫若、陳望道等二百餘人、十五家雜誌社發起手頭字運動，並挑選了三百個手頭字作為簡體字進行推廣，其中約有一半的字被後來的第一批簡化字所採用，如“与”、“过”、“呕”、“对”、“尽”、“怜”、“卖”、“战”等，還有一部分被已經廢止的第二批簡化字所採用。《推行手頭字緣起》這樣說：“我們日常有許多便當的字，手頭上大家都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這麼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現在我們主張把‘手頭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讀書人記憶幾種字體的麻煩，使得文字比較容易識，容易寫，更能普及到大眾。”<sup>③</sup>這實際上是讓正字遷就或讓位於手頭字，也可以說是文字下移。但手頭字實際上有問題的，第二批簡化字被廢止就說明了其問題。原因在於，手頭字很隨意，很多是破體字、別字、錯字、生造字，不符合漢字規則，不能根據字形望文生義，實際上比正字更難識、更難記。豐子愷曾描述民間手頭字的書寫狀況：“我家自洪楊以來，以開染坊為業。我十來歲時，每逢年假，店裏忙的時候，被母親派到店裏去幫忙……因此學得了染坊賬簿上所慣用的種種簡筆字，例如‘三藍’，他們寫作‘三卅’，不過卅字最後一筆下面打一個彎曲。‘二厘’，他們祇在‘二’字的下一畫上拖一撇，其餘不勝枚舉。”後來，作者在上學時也寫手頭字，如把“青出於藍”寫作“青出於卅”，老師罵他說：“你倒不寫青出於卅？”<sup>④</sup>染坊裏約定把“藍”寫作“卅”，“厘”寫作一撇，幾個人認同是沒有關係的，但推廣作為全民規範字卻是有問題的，不能說群眾使用了就是正確的。所以，俗字和手頭字在生活中都限於手書，都祇適用於通俗文書，主要是記賬、書信、藥方，便條等，通行的範圍非常有限，具有約定性，如果強行“轉正”作為印刷字、正字，其實是有違其本性的。

① 南兆旭 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第5卷，第190頁。

② 張涌泉：《漢字俗字研究（增訂本）》，第1頁。

③ “推行手頭字緣起”，《太白》11（1935），附頁。其中，“勾”是“夠”的手頭字，“衆”寫作“𠂇”。

④ 豐子愷：“我與手頭字”，《太白》1（1935）。“卅”音同“哈”，所以有此幽默。



錢玄同曾歸納出八種簡化字方法：“將多筆畫的字就字的全體刪減，粗具匡廓，略得形似”、“採用固有的草書”、“將多筆畫的字僅寫它的一部分”、“將全字中多筆畫的一部分用很簡單的幾筆替代”、“採用古體”、“將音符改用少筆畫的字”、“別造一個簡體字”、“假借它字”<sup>①</sup>，但這每一種方法都是有問題的，都會造成混亂。例如，現代簡體字中“台”、“檯”、“臺”、“颱”四個字合併成了一個字，還有“臺”作為“構件”的字，“構件”有時可以類推簡化為“台”，有時又不能類推。本來，這四個字的意思是極分明的，但簡化成一個字之後，意義也合併了，究竟是什麼意思，還得根據上下文來確定。又如，“蒙”、“矇”、“濛”、“檬”四字不分，又保留“懵”作為異體字；“复”、“覆”、“複”、“復”四字不分，“覆”有時簡化，有時又不簡化；“干”、“乾”、“幹”三字不分，“乾”有時簡化，有時又不簡化，“乾坤”不能簡化為“干坤”，還有“后”和“後”簡化之後不再作區分，以致書法家有“影後”之笑話。漢字是“字思維”文字，漢字簡化之後，“字思維”被破壞了，漢字表意體系被弄得不倫不類，雖然在書寫上簡便了一些，但意義區分卻更複雜了，很多規律被破壞了，意義識別祇能靠死記硬背，不僅增加了中國人的學習負擔，也不利於漢字和漢語的國際化，它希望解決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但卻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張書岩等人總結簡化字有五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部分同音代替不適當”，“對於偏旁的簡化和類推規定得不夠明確合理”，“計劃性、系統性不夠，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少數簡化字所用的偏旁或筆畫不適當”，“某些簡化形體代替的偏旁過多”。<sup>②</sup>其實，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具有普遍性，並且難以改正。漢字簡化的“利”遠小於其“弊”。

1960年代簡化字推廣之後，國家嚴格控制出版繁體字書籍，繁體字從中國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消失了。但這種局面維持了不到三十年，1990年代以來，繁體字的著作越來越多，最初是古人的作品和著錄用繁體字出版，後來研究古人的現代人學術著作也可以用繁體字出版，再後來一些與“古”有關的邊緣性著作也可以用繁體字出版，近人的著作也算古籍，似乎“作古”就算“古”代。例如，《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sup>③</sup>、《啓功叢稿·藝論卷》<sup>④</sup>都是繁體字印刷的，極少數翻譯著作如《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也是用繁體字印刷的，出版社的解釋是：“由於本書所研究的十九世紀漢語語料都是用繁體字印刷的，漢譯本全書也使用了繁體字。”<sup>⑤</sup>儘管解釋很勉強，但可見繁體字的出版規定不斷地被突破。繁體字在學術領域越來越成爲了一種有品位的象徵，尤其是一些與中國古代有關的學術領域，學者們已經開始恢復繁體字寫作，除了時尚因素外，更多是爲了準確。例如，在古人那裏，“颱風”就是“颱風”，現在把它寫成“台风”是錯誤的。

祇要中國古代典籍不消滅，繁體字就不可能廢除。繁體字與簡體字在使用上是不對等的，1950年代出版的簡體字書籍可以轉換用繁體字來印刷，但古籍不能用簡體字印刷，簡體字印刷古籍會造成很多錯誤、很多莫名其妙和不能理解。中國目前事實上是繁體字、簡體字並行使用。一個國家是這樣，國家中的許多個人也是這樣。認識繁體字將越來越成爲一個中國人的基本素質之一，而且繁體字有越來越通行的趨勢，所以中國人越來越需要學習兩種字體。這有點反諷，本來當初探討並推行簡體字是爲了減省漢字學習的負擔，但現在不僅沒有減輕負擔，反而增加了負擔，不僅要學簡體字，還要學繁體字；過去，繁體字雖然書寫麻煩、費時，學習上難了一點，但那時祇學習一種，現在則要學習兩種字體，而且簡體字學起來並不比繁體字容易，因爲簡體字中很多字都與字義沒有關係，是硬性規定的，祇能死記硬背。1950—1980年代，手書還非

① 錢玄同：“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89—90頁。

② 張書岩等：《簡化字溯源》（北京：語文出版社，2014），第38—39頁。

③ 《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④ 《啓功叢稿·藝論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

⑤ [意]馬西尼：《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黃河清譯，第1頁。



常普遍，應用也非常廣泛，簡體字在書寫上的確可以節約一點時間，但這點時間相對於整體漢字漢語運作來說是微不足道的；現代社會特別是電腦普及之後，就連這點微不足道也沒有了。現代人大多都用電腦書寫，不管是拼音輸入法還是五筆輸入法以及其他輸入法，簡體字和繁體字敲打鍵盤的次數在技術上是一樣的。簡體字對於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提高國民素質的作用是有的，但也要看到，香港、臺灣使用繁體字，普及教育並沒有因此而落後，並沒有因此而文盲增多。相反，簡體字倒是大大加深了中國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隔膜，因為普通國民很多人都不認識繁體字，因而不能讀繁體字印刷的古籍。

在中國內地，可以通過政策法規來保護簡體字，推行簡體字，限制繁體字的通行，但它對於臺灣、香港、澳門以及華人聚集較多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不具有約束力，無法改變這些地區和國家使用繁體字的現實。隨着世界交流越來越廣泛，特別是文化交流越來越深入，中國內地用簡體字，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漢語用繁體字，這是不利於文化交流的，簡體字事實上越來越成爲中國內地書籍向海外傳播的一大障礙。同時，內地漢語用簡體字，海外漢語用繁體字，會造成漢語的分裂，對漢字和漢語都是巨大的傷害。隨着世界一體化的發展，隨着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簡體字越來越成爲中國文化的一個負擔、一個包袱，即使現在廢止簡化字，它也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來消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體，既有民族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也有語言共同體，並且語言共同體是更深層更穩固的共同體。在語言共同體中，漢語是重要而有影響的共同體，但簡化字是不利於漢語共同體建構的。因爲語言的書寫具有約定俗成性，共同體的成員更改文字須得到其他成員的認同，並且相約一起更改纔行。雖然中國內地在漢語共同體中是主體，具有絕對的主導作用，但如果漢語共同體的其他成員都不使用簡體字，久之會造成漢語共同體的撕裂，對大中華也是一種傷害。

反省1950年代的簡化字運動，簡化方案從醞釀到出臺用了六年時間，其間也曾反復修改和徵求意見，但對於涉及千秋萬代的文化大事業來說，整個方案仍缺乏充分的學術上的論證，很多問題沒有考慮到。相反，1980年代對於漢字簡化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是正確的。例如，廢止第二批簡化字，王碼輸入法被阻止進入小學語文課本，漢字整形沒有獲得通過等，否則，漢字將更加混亂，中國人學習漢字的負擔將更重。語言越是成熟，就越是複雜，祇有複雜的語言纔能充分表達複雜的思想。漢語作爲表意文字，需要一定數量的漢字作爲支撐，並且漢字是需要一定筆畫的，一定數量筆畫的字特別是形聲字反而容易識別和記憶；相反，最容易搞混淆的恰恰是一些筆畫簡單的字，如“已經”的“己”、“自己”的“己”、地支的“巳”，還有“日”“曰”等。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最大的問題不是筆畫太多，而是異體字太多，有些寫法相差很大，這纔是漢字學習包括字形字義識別和記憶的最大負擔。倘若1950年代選一種流行最廣、最能爲人們所接受的字作爲標準字，整理出一個分級別的通用字表，然後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會比推行簡化字要好，更能夠被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華僑所接受。

歷史已經走到反思簡化字、考慮統一規範使用繁體字的時候了。